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梁启超“豪杰译”研究

蒋 林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梁启超“豪杰译”研究

蒋 林 著

本书为浙江省重点学科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系列学术丛书之一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豪杰译”研究/蒋林著.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1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978-7-5327-4679-8

I. 梁… II. 蒋… III. 梁启超(1873~1929)-翻译理论-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5602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梁启超“豪杰译”研究

蒋 林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74,000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200册

ISBN 978-7-5327-4679-8/H·874

定价: 21.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401196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8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梁启超生平简介及其译学贡献	/3
第二节 梁启超翻译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17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意图、方法和意义	/26
第四节 本论文的研究架构	/28
第二章 梁启超与“豪杰译”的由来	/31
第一节 何为“豪杰译”?	/33
第二节 “豪杰译”形成的原因	/47
第三章 翻译目的论视域中的梁启超“豪杰译”	/65
第一节 翻译目的论概述	/67
第二节 “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翻译目的的具体体现	/71
第三节 “觉世”的用心与“觉世之文”的契合	/85

目 录

Contents

第四章	梁启超“豪杰译”的文体特征及其文体生成	/97
第一节	翻译文体概说	/99
第二节	“豪杰译”的翻译文体特征	/108
第三节	“豪杰译”的翻译文体生成	/125
第五章	翻译与时代需求:梁启超“豪杰译”的文化意义	/145
第一节	晚清翻译与时代精神的契合	/147
第二节	“豪杰译”文本的现代性内涵	/162
第三节	“豪杰译”在中国近代小说转型中的作用	/176
第六章	结论:梁启超“豪杰译”的历史定位及评价	/191
	参考文献	/207
	后记	/223

第一章

绪 论

梁启超属于一位个性鲜明,在“学术与政治之间”^①游走的人物。他曾经投身于政治,目睹权力斗争的真实,遂产生厌倦的心情,转上学术的道路。梁启超不是一个精粹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纯然的学者:搞政治不忘学术,搞学术又难忘政治。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的身影,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并不孤单。

第一节

梁启超生平简介及其译学贡献

1.1 梁启超生平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少年中国之少年等,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农民家庭。梁启超自幼天资聪颖,四五岁时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就能写出上千字的八股文,十一岁中秀才,随后进入广州著名的学海堂^②学习,舍帖括而沉湎于词章训诂之学。1889年,梁启超十六岁时考中举人^③。1890年梁启超在其父的陪同下赴京会试,但

① 这是作者蒋连华对思想家徐复观所作的准确描述(详见蒋连华,《学术与政治——徐复观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笔者认为,把它用在梁启超的身上也同样合适。

② 学海堂为两广总督阮元(1764—1849)创办,学堂里所授内容以训诂词章为主。

③ 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十分赏识梁启超的才华,主动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从此梁李结为姻亲。

不幸落第。在他回广州途经上海的时候,在坊间购得一本徐继畲编写的《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①,眼界自此豁然大开。是年秋,拜康有为为师,自此决然舍去旧学,转向陆王心学、史学和西学,“生平知有学,自兹始”^②。在万木草堂求学期间,协助乃师校勘《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开始全面接受康有为的维新思想。

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梁启超与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发起了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变法。梁启超由此正式登上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的政治舞台。翌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出任该报主笔,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鼓动人心的政论文。在《变法通议》这篇最有影响的名文里,梁启超以“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③的文字,痛快淋漓地论述了变法势在必行的道理:“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当今之势,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主动变法,“变之权操诸己”,被动变法,则“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④梁启超以报刊政论家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举成为“言论界之骄子”,“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陋,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⑤。1897年10月,梁启超离沪抵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向学生鼓吹民权思想。1898年4月23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由此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在此期间,梁启超受命负责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⑥

①② 梁启超,“三十自述”,见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65页。

③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100页。

④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见陈书良选编,《梁启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⑤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47页。

⑥ 1898年5月5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同时又发布上谕,命以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详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合集·文集》之3,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第21—23页。

同年8月6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乘大岛舰从天津逃亡日本,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

1898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1902年春、冬间又先后创刊《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道铎之一助”^①,梁启超以报刊为宣传阵地,发表了如《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等轰动一时的文章,继续进行维新变法和开启民智的鼓动工作。在亡命日本的最初几年,梁启超与孙中山过从甚密^②,一度倾向革命。后游历美洲归来,思想渐趋保守,转而主张保皇立宪,在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问题上与革命党人发生过激烈的论争。1910年初,《国风报》创刊,梁启超在该报发表了百余篇文章,鼓吹实行政党政治,一举成为中国近代的宪政旗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于第二年10月返回天津,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随后组党结社,并先后出任民国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等职。1915年8月,梁启超针对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人成立筹安会的帝制复辟活动,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③一文,并联合学生蔡锷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为护国战争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1917年,军阀张勋在康有为等人支持下,借调停黎段

① 梁启超:“三十自述”,载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67页。

② 梁启超到达日本后,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梁在1902年10月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于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6页。

③ 据说此文起草之际,袁世凯便获悉其中内容,托人送来20万元巨款,希望不要发表。梁启超不仅婉言拒绝,而且还将文章抄录一份寄给他。见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载《合集·专集》之33,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第143页。

之间的“府院之争”的名义率兵进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梁启超发表了“反对复辟电”,并参加段祺瑞的“讨逆军”,成为“再造共和的急先锋”^①。是年11月,梁启超辞去段内阁财务总长之职,正式宣布退出政坛,转而致力于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

1918年至1929年是梁启超一生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他是以学者、教授的身份度过的。他曾在清华研究院、南开大学、东南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书讲学,先后赴济南、南京、上海、南通、长沙、武汉、天津、苏州等地作学术讲演二十余次。梁启超的讲演声情并茂,感人至深。^②他晚年写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经典名著,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页。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56岁。梁启超一生笔耕不辍,卷帙浩繁,文稿总计达1400万字,主要收录在《饮冰室文集》^③、《饮冰室全集》^④和《饮冰室合集》^⑤里。“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⑥这既是任公先生的自励之言,又是

①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② 曾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回忆梁启超的讲演情形:“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他最喜欢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见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312页。

③ 由梁启超的学生何天柱结集而成,收录了梁1896年到1902年间在《时务报》、《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它是收录梁启超著作最早的集子。

④ 此书约200万字,主要内容为梁启超1902—1915年间所写的政论文章和一般的学术论文,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⑤ 由梁的生前好友林志钧编辑而成,193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后数次重印。《合集》共40册149卷,约1000万字左右,基本上收入了作者所有已刊论著,并收入不少未刊文稿。它是目前收录梁启超著作最全的集子。

⑥ 梁启超,“自励”,载《合集·文集》之45(下),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第16页。

他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的一生明显分为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启超的“常带情感”的文字,唤醒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他们走上了救国救民之路。现当代中国的许多领军人物,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毛泽东等都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郭沫若在其回忆录《少年时代》中说:“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一个代表”,那时的一些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力的代言人。”^①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十分佩服梁启超,对他顶礼膜拜,甚至向社会呼吁:“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②梁启超的历史地位也得到外国人的高度评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认为梁启超是1911年中国第一次革命的“精神之父”,日本人伊藤博文说他是近代中国的“珍贵的灵魂”。^③令人钦佩的是,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外,梁启超在学术方面也有不凡的表现。作为中国近百年来不可多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在政治学、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法学、佛学、美学等均有较深的造诣,在这些领域都有开先河之功。钱玄同在论及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时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④“他(指梁启超——笔者注)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粉碎。”^⑤

① 郭沫若,《少年时代》,北京:海燕书店,1947年,第125—126页。

② 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页。

③ 转引自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年,“引言”第1页。

④ 钱玄同,《寄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

⑤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63页。